

山西平遥清虚观道教文化探析

□ 刘卫涛

清虚观,位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东大街东段路北。始建于唐显庆二年(657年),原名太平观。宋治平元年(1064年),敕赐牒文,改名清虚观,元祐七年(1092年)重修。金明昌六年(1195年)补修。元初更名为太平兴国观,蒙元宪宗二年(1252年)赐名太平崇圣宫并重修。清代复称清虚观。明成化、万历和清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光绪年间曾有补筑、修葺。坐北向南,前后三进院落,占地面积 5891 平方米。中轴线上依次建有牌坊、山门、龙虎殿、纯阳宫、三清殿、玉皇阁(阁不存),两侧建耳殿、廊庑等。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清虚观是平遥古城内现存最大的道教宫观。观内保存的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碑碣种类繁多,内容丰富,有记事碑、文牒碑、题字碑、画像碑、宣

谕碑、圣旨碑、符篆碑等。这些碑碣不仅是清虚观历史的真实记录,也是研究清虚观道教文化乃至中国道教发展史的珍贵史料。本文以中国道教发展史为背景,以清虚观现存历代碑碣为依托,拟对清虚观道教文化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。

据现存清虚观内的宋元祐七年(1092年)《汾州平遥县清虚观记》碑记载:“平遥之清虚观,建于唐高宗之末年,观名太平。”清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《重修清虚观碑记》载:“清虚观,平遥古迹也,其肇建在唐显庆二年,名太平观。”唐显庆二年(657年)为唐高宗李治(649-683年在位)统治初期。显然,两碑对清虚观创建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,一说为唐高宗末年,另一说为唐高宗初年。但可以这样讲,清虚观创建于崇尚道教的唐高宗统治时期是毫无疑问的。



清虚观龙虎殿

道教形成于东汉顺帝(126-144年)时,以张道陵在四川鹤(鹄)鸣山开创五斗米道(后称天师道、正一道)为道教产生的历史开端。五斗米道是黄老道与巫道相融合的宗教,尊崇黄帝、老子,诵习《老子五千文》,并在巴蜀一带立“二十八治”(合二十八宿)为据点(教区中心)、“治”内置职,建立了独特的教团组织体系,进行“付天仓”(交纳信米五斗)、“三会”、“宣行道法”及授箓等宗教活动。后来,张道陵之孙张鲁雄据汉中三十年,实行政教合一,推广五斗米道。张鲁后又归顺曹魏,得封万户侯,五斗米道得到公开广泛传播,以后遂被视为道教的正统。早期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革与发展,到唐代时,由于唐统治者以道教为“本朝家教”,或谓为“皇族宗教”,有意加以扶持,因此唐代是道教的全盛时期^[1]。

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。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,所以从高祖李渊起,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,积极扶植道教,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^[2]。特别是到唐高宗时,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,使道教与唐室皇权结合起来,正式成为皇族宗教。主要体现在:第一,乾封元年(666年),尊封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,首开唐王朝统治者给老君册封尊号的先河。还建了祠堂,设置官吏管理,表示确认老子为李唐宗室的祖先。第二,上元元年(674年),规定王公、百官都要学习《道德经》,并把它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。第三,仪凤三年(678年),令道士隶属宗正寺,班列于诸王之次。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,把道士划归它管理,即是将男女道士视为自己的本家。这实际上是大大抬高了道士的地位。第四,弘道元年(683年),诏令全国各州修建道观等^[3]。由此看出,唐高宗大力推行崇道政策是在其统治的中、晚期。而清虚观在唐高宗统治初期的显庆二年就已经诞生了。

曾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(712-756年在位),是一位竭力扶持和利用道教的皇帝。开元九年(721年),玄宗亲受道教法箓成为道士皇帝,大力推进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。先后追封老子为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、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、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帝”,不断给老子封爵加号。同时,让人绘制玄元皇帝像颁于天

下。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、文子为通玄真人、列子为冲虚真人、庚桑子为洞虚真人,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,壮大了道教的势力。设置崇玄馆和玄学博士等,纂修了我国的第一部《道藏》——《开元道藏》。玄宗还亲自注释《道德经》,亲自制作《霓裳羽衣曲》等道教音乐,亲自教道士步虚声韵等。现存清虚观内的北宋治平元年(1064年)《唐明皇梦群仙图记》碑,详细记述了唐开元二十三年(735年)“明皇梦群仙见于罗氏,分遣使者旁求于天下”,并终获“二十七仙人玉像”一事。传说使臣将玉像带回朝中,玄宗曾命全国最有名的画师将这些玉像绘制成图,悬挂宫中,“安史之乱”以后,这些玉像图全部失传^[4]。而清虚观内的这通碑,在记事碑文的下方还刻有二十七仙人的画像、姓名及其得道处。尽管这些画像很可能与当年唐宫廷画师的作品有很大出入,但这通《唐明皇梦群仙图记》碑不仅为现存平遥境内最早的道教碑,而且不失为研究清虚观乃至中国道教文化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清虚观在唐代的兴盛之景已无记载。之后,经历了唐末兵乱、五代十国的百年烽烟,到北宋时已破败不堪。但在北宋历代帝王崇奉道教的有利氛围中,清虚观再度兴盛了起来。

《唐明皇梦群仙图记》碑阴为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年)敕赐“平遥县太平观”为“清虚观”的文牒,由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赵概及欧阳修、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曾公亮、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韩琦等朝廷有关部门官员联名签署,刊刻成碑。牒碑现存甚少,属珍贵文物。此牒碑是考证清虚观历史的重要史料,同时也反映出北宋统治者对道教宫观的重视程度。

宋哲宗元祐七年(1092年)《汾州平遥县清虚观记》碑还详细记述了由居观道士武太文首倡、朝散议大夫裴公带头支持,重修清虚观并补塑圣像的始末。

“……本朝赐名清虚,百余年来废坏不修,日月浸久,唯元始天尊像仅存焉。……于是增大元始天尊殿,而益之以道君老子之像。又为小殿四,一以奉玉皇十一曜列焉,一以奉北极十二元辰列焉,一以奉天地水三官,一以奉真武而北斗列焉。既为之道堂,又为之庖舍,凡以居其徒者无不备



清虚观纯阳宫及三清殿

焉。今之过其前，怪其大厦轮奂，金碧照曜，出于颓垣废屋之后，庭除洁清，坛墀完整，出于荆榛白露之中。黄冠云来，步虚逍遥……”不难看出清虚观当时的隆盛景象。

在北宋历代帝王中，尤以宋真宗赵恒（997-1022年在位）、宋徽宗赵佶（1100-1125年在位）崇道为甚。宋真宗模仿唐朝宗祖老子的办法，来抬高皇帝的地位和显示神必佑宋室的可靠性。可是道教至尊之神太上老君姓李，不能为赵氏皇帝装饰门面，于是宋真宗假托梦见神人传玉皇之命，硬是造了一个“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”，扬言这是赵氏帝王的族祖。侍臣们迎合真宗的旨意，多次伪造、颁赐“天书”，导演“天神下降”的闹剧。宋徽宗甚至集教主、道君、皇帝于一身，这是历代崇道的帝王中所绝无仅有的一个，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最高峰，同时也将道教扶持、抬高到了历史的高峰。结果是，误国殃民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^[5]。

清虚观内保存有宋徽宗大观三年（1109年）郝纯的题字刻石。其内容前部分为郝纯题字，后部分为县邑尉贾说附记。郝纯为礼部学士，大观三年授命还乡，在清虚观济众发药并留住三日，

观主将其书题石流传于后世^[6]。

南宋初，北方为金朝所统治。《汾州平遥县清虚观修造记》石碣记述了金明昌六年（1195年）由平遥彰善里人王寅带头、邑之豪杰共同维修清虚观的史实，知观道士张致渊刻石以示纪念。

“……今夫清虚观者，乃高真降临之所，官民香火之地也。观其轮奂之美，是为琳宫之冠。爰自唐宋迄于本朝，其间虽补弊起废，以至于今美则美矣，独三门之南颓垣堕陞，鞠为茂草，良可惜也。建明昌乙卯之春，彰善里王寅者，积善之士也。……方命工经始间，邑之豪杰，闻而大悦，共助而成之。于是，垣墉易之，以瓴滴檐饰之，以金碧惜之，毁秽灿然一新……。”

宋、辽、金、元（960-1368年）四百多年，由于不断的政治变动及南北对峙、封建割据，促使道教亦南北分宗，各演教义，新的道派在大江南北纷纷兴起。全真道、真大道、太一道兴起于北方，正一道、净明道则兴盛于南方^[7]。清虚观现存元代碑碣真实地反映了全真道在平遥古城的兴旺历史。

全真道北宗（南宗盛行于江南，此不赘述）的开创者是王喆（1112-1170年），道号重阳子，陕

西咸阳人。金大定七年(1167年),王喆至山东宁海立全真庵,创立全真教。其教义主要以“三教圆融”、“识心见性”、“独全其真”为宗旨,故名其教为“全真”。王喆主张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,以《道德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心经》为必修经典,所立教会皆以“三教”名之(如三教七宝会、三教金莲会、三教平等会等),他不独居一教,而是倡导三教平等、三教圆融,这是全真道的主旨和特点,也是对唐宋道教的一大变革。王喆去世后,由其七位得意弟子马钰、谭处端、王处一、刘处玄、郝大通、丘处机、孙不二等继承其教业。后马钰(丹阳)创全真遇仙派、谭处端(长真)创全真南无派、王处一(玉阳)创全真崑山派、刘处玄(长生)创全真随山派、郝大通(广宁)创全真华山派、丘处机(长春)创全真龙门派、孙不二(坤道)创全真清静派。道教统称之为“全真道北七真派”。其中以丘处机开创的全真龙门派最为盛行,累代不衰^[9]。

丘处机(1148-1227年),道号长春子,山东栖霞人。曾奉诏远赴西域大雪山(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)谒见蒙元太祖成吉思汗(1206-1227年在位)。“太祖时方西征,日事攻战。处机每言,欲以天下者,必在乎不嗜杀人;及问为治之方,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;问长生久视之道,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。太祖深契其言,命左右书之,且以训诸子焉。”^[9]丘处机被元太祖称为神仙,并管领“天下应有的出家善人”。随之,全真道益发兴盛。丘处机去世后,嗣其教业者有尹志平、李志常、宋德方等“十八宗师”。

尹志平(1169-1251年),仙号清和子,为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随行十八弟子之冠。继丘处机之后的第一任全真掌教人,后曾住持平遥清虚观(当时称太平兴国观),现存观内的2通(方)元代碑碣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。

1. 元太宗九年(1237年)“清和真人题刻”石碑,其内容由真人手书和李晋子书跋两部分组成。

“(大字)清和子□

(跋文)清和真人嗣掌大教,四方簪冠之辈、清信之流,不远千里送供受教,辐凑堂下,莫不焚香设礼,以求请真人亲笔仙号手字者,仅二十年间曾不虚日。得之者莫不朝夕瞻礼,以为保佑辟

除之宝焉。燕京大长春宫提点大师夏志诚,意真人年老倦于批写,又虑纸墨历以多岁易为腐蠹,遂将真人亲书仙号手字刻诸翠琰,已立于长春宫□,以遗将来诚不朽之计也。且吾邑太平兴国观,亦真人住持之地,是以提点大师潘德冲亦□彼而立石焉。丁酉岁上元日西源散人李晋子益跋。”

从以上碑文中可以看出尹志平嗣掌全国道教时的繁荣景象。同时可以得知:自宋英宗赐名“清虚观”以来,到“丁酉岁”即元太宗九年(1237年)时,已更名为“太平兴国观”,而且,太平兴国观亦是清和真人尹志平住持之地,因此,太平兴国观提点大师潘德冲效仿燕京大长春宫提点大师夏志诚“将真人亲书仙号手字刻诸翠琰,已立于长春宫”之做法,亦将清和真人亲书仙号“清和子”刻石立于清虚观内,以成不朽,供人临拓,作为保佑辟邪之宝物。

2. 元太宗九年(1237年)《清和真人真像之记》碑,碑阴为镌刻清和真人真像之碑铭,碑阳为清和真人之像。

(碑阴)“窃以大道肇兴,爰自玄元之祖。真风载阐,继生傲吏之徒世且虽殊,人斯不乏敬。惟我清和师父仙风素稟,道价孤高,实王重阳之嫡孙,乃丘长春之高弟,人争景仰,众喜归依,教掌于二十余年,名益乎二千去。东西非像,徒见存思。幸兹绘塑之一新,须念贤豪之众力,庶传不朽,谨纪芳御。(以下为平遥县都达鲁花赤迷鲁海速纳夫人、平遥县尹梁瑜偕夫人等众多官佐及家属芳名)右优愿各家眷属无夭昏暴陵之灾,合境生灵享高寿康宁之路,胜缘永结法会,长逢□□有□□道岸。岁在丁酉上元日南轩老人张天祚记。太上正一盟威法师赐紫冲和大师提点太平兴国观。”

(碑阳)刻清和真人之坐像,其仙风道骨飘逸洒脱、风姿可见。碑右边落款处有“平遥太平兴国观建”字样,进一步证实了清和真人住持于此时“清虚观”称为“太平兴国观”。它是清和真人住持太平兴国观的又一佐证,亦是清和真人题字刻石的互证。

此外,碑碣中提到了全真教中的重要人物潘德冲。潘德冲字仲和,淄之齐东人。也是丘处机的弟子,曾随丘谒见成吉思汗。尹志平主持道教时,

他是燕京都道录兼领宫事。元太宗后元年(1242年)为诸路道教都提举,仍兼燕京道录。过三年,为河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,开始营建山西芮城永乐宫。元宪宗六年(1256年)死于永乐宫。他一生最主要的事情是修建永乐宫^[10]。可以说,以上两通(方)碑碣是考证清虚观历史、研究中国道教源流的重要史料。

据文献记载,尹志平勤于诲人,严于律己,他告诫弟子于教门兴盛之际,尤须努力修行,不能安享其成而无所作为,修道者唯有积行累功,克己济人,方能得道。他一生不慕荣利,甘居淡泊,连当时人所共慕之掌教职位,亦持谦让态度。当丘处机居长春宫,四方请谒不绝之时,以“我无功德”、不敢享此供奉为辞,而退隐于僻处;当丘处机逝世,遗命其继任掌教时,则欲绝迹远遁,只因众人敦请,始勉从之;当掌教十一年(1227-1238年)后,又以年老为辞,请李志常代主教席,而隐居修炼^[11]。清虚观曾一度为全真教第六代掌教宗师尹志平住持之地,其在当时全国道观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。

元太宗十年(1238年)春,尹志平以年老荐李志常继任掌教。李志常(1193-1256年),号真常子,亦为丘处机西游十八随行弟子之一,其著作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对研究我国西北和西亚史地以及中西交通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李志常掌教十八年(1238-1256年)中,深得元太宗、宪宗支持,全真教继续得以发展和繁荣。元宪宗三年(1253年)“太平崇圣宫宣谕”石碣,不仅是考证清虚观历史沿革的实物资料,而且其碑文按官文格式,在年号上还刻有官印,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。

此石碣内容分上下两部分。上文为癸丑年正月即元宪宗三年(1253年)宣谕,下文为壬子年七月初五日即元宪宗二年(1252年)蒙哥皇帝圣旨。

上文:“□□□□□里□□□宣谕:倚付汉地先生头儿那延李真人悬带□□金牌掌管教门事。照得钦奉到蒙哥皇帝御宝圣旨节文:汉儿田地里应有底先生每都教李真人识者,除钦依外,今据太原府路平遥县太平崇圣宫提点李志端状告:伏为本宫自唐朝以来,有元住道士薛守玄重

修兴建,额曰‘太平观’,后至宋朝元祐年间改为‘清虚观’。今自大朝兴国以来,为本官兵革之后,殿宇房屋全无损坏,因此有本县长官梁瑜,并万户梁瑛等,经诣本府乞改名额为‘太平兴国观’,各有已立碑记。近蒙掌教大宗师真人师父再更为‘太平崇圣宫’名。李志端依奉已于壬子年七月十五日安置牌额,悬挂了当……。”

下文:“蒙哥皇帝圣旨里:宣谕倚付汉儿田地里应有底先生每底官人□真人悬带御前金牌。钦奉蒙哥皇帝御宝圣旨拣数勾当等事,除钦依外,据太原府平遥县太平崇圣宫提领燕志静状告,伏为今年六月内蒙掌教宗师法旨,该清和大宗师法旨自燕京,令道众前来重修太平崇圣宫……。”

从以上碑文中得知,在元朝兴国之际,经平遥县尹梁瑜和万户侯梁瑛等,报请汾州府批准,将“清虚观”改名额为“太平兴国观”。“太平兴国”四字是元朝兴国历史的真实写照。之后,经掌教大宗师真人师父报请元宪宗蒙哥皇帝,于壬子年即元宪宗二年(1252年)七月十五日正式赐名“太平崇圣宫”并重修。

在汉魏之世,佛道相依相杂,并未出现相互诋毁状态。及至佛教日趋兴盛,佛道之互争邪正高低遂起。魏晋南北朝时,楼观为道教在西北地区的活动中心,其力阐老子之道,宣扬老子西升与化胡之说,出现了《西升经》与《老子化胡经》,使道教开始卷入佛道斗争的漩涡。元时,佛道斗争依然存在,元宪宗、元世祖时曾一度十分激烈,元宪宗八年(1258年)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(1281年),道教曾遭受两次焚经之祸,受到挫折,渐渐趋向低潮^[12]。

在道教处于低谷之时,清虚观内还保存有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(1286年)石碣1方,为门人提举徐志清篆书2行,每行8字,亦较珍贵。观内现存的元成宗大德元年(1297年)“八思巴文示谕碑”,国内罕见。此碑碑阳为八思巴文书写的圣旨,碑阴为汉字译文,因系直译,文词文法极其生涩。虽不能通读译文,但从“冀宁路平遥县太平崇圣宫住持的本宗提点道义中和大师,本宫提点高道陟栖远常妙大师,提举赵道恒”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碑仍属道教碑,是研究后期道教的珍贵史料,也是研究元朝历史及蒙古文字的珍贵资

料。此碑石质特殊,天气阴雨前碑面会出现潮湿现象,被当地人称为“透灵碑”,并视为至宝。

通过以上碑碣,不难想象全真道观清虚观在元代的兴旺之景。

明清时期,道教如强弩之末,已不如往昔声势之大,而是日渐衰落。究其原因,一是由于明清统治者对道教实行利用和严加控制的政策,明代曾敕令检束,清代则实为斥贬,乾隆年间(1736-1795年)即宣布黄教为国教,道教为汉人的宗教。道教逐渐失去过去统治者的狂热宠信与大力扶持。二是明清为我国封建社会已趋没落的时期,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思想已呈停滞状态,宗教思想由于三教交融而导致三教交缠不清,缺乏深入的、有特征的发展。三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,资本主义因素的逐渐活跃,反封建的新文化、新思想逐渐兴起,自然冲击着封建性较强的道教,动摇其宗教唯心主义的神仙理论体系;四是西洋科学技术及基督教的传入,也影响了我国固有宗教的生存和发展。这些历史条件,都影响道教的发展趋势^[13]。

清虚观内现存明万历年间《重修太平兴国观记》碑及“第二碑记”、“第三碑记”、“第四碑记”中,详细记述了明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(1609-1615年)进行大规模重修的经过及布施人名,只可惜已风化严重。

清康熙三十年(1691年),平遥知县黄汝钰捐俸并发出了“工程浩大,身非一木能支。道力无边,须赖众擎易举,愿我陶土民或金或粟,量力为施,或寡或多,随缘乐助”的倡议,《募修清虚观引》实则为募修清虚观倡议书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《重修清虚观碑记》、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《补修清虚观新建纯阳宫碑》记述了清代先后两次大规模修葺、补筑清虚观的史实。可见,作为道教活动场所的清虚观在民间仍然得到了信仰者的青睐。

道教所从事和宣扬的道术很多,如占卜、符篆等^[14]。清光绪三年(1877年)、十一年(1885年)“刻卦谱及吕祖四科版碑记”2方石碣及光绪十二年(1886年)《镇宅符碑》就是例证。其中《镇宅符碑》即属于道教符篆的一种,其碑阳由“镇宅符”与说明文字组成,据说以朱砂拓于宣纸上,挂

在中堂,“自能镇宅驱邪,斩妖伏怪退厉鬼,避瘟神益眷保家,大吉大利也”。

明清以后,道教基本已停滞发展。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,近代科学的日渐昌明,道教这一古老宗教,仿佛消失了它得以滋长蔓延的沃土,而逐渐衰微^[15]。清光绪末年,清虚观内兴办学堂,民国后曾改为学校、军营、军队留守处、粮库等。1973年,清虚观被平遥县革命委员会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后,清虚观逐步得到有效保护,并于1998年被辟为平遥县博物馆。如今,每逢农历四月十四吕纯阳诞辰日,信仰者仍会前来焚香设礼,祈求平安。

古人将历史镌刻于石碑上,以流芳百世、永垂不朽。清虚观虽历经千百年世事沧桑,保存至今的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碑碣,却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历史记忆。透过这些碑碣,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虚观的历史,甚至可以追寻中国道教发展的历史;也可以说,清虚观是中国道教发展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。

[1][5][7][8][9][12][13][14][15] 李养正著《道教概说》,中华书局,1989年。

[2] 朱绍侯主编《中国古代史》(中册)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85年。

[3] 谢路军著《中国道教源流》,九州出版社,2004年。

[4] 《正宁县名由来》(友人文章)-巩耀华-新浪博客,转自文正廉著《正宁文史资料选编》,来源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fb35fb70100d5sj.html。

[6] 张晋平编著《晋中碑刻选粹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1年。

[10] 徐萃芳《关于宋德方和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》,《考古》1960年第8期。

[11] 百度百科-尹志平 <http://baike.baidu.com>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票号博物馆)